

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

全漢昇

一

美國于一七八三年獨立革命成功後，即于翌年（1784，即清乾隆四十九年）派遣第一艘商船來華貿易。這艘船名叫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于一七八四年二月廿二日自紐約出發，橫渡大西洋，再經過南非洲的好望角，于八月廿八日抵達廣州的黃埔。（註一）此後便展開一個中、美貿易的新時代。

可是，這不過是中、美兩國貿易的開始，而不是中國與美洲間貿易的開始。約較中國皇后號來華的時間早兩個多世紀，即自明嘉靖（1522—66）末年、隆慶年間（1567—72）開始，由菲律賓居中作媒介，位于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與美洲，雖然有遠洋的阻隔，雙方的貿易關係已經開始發展起來了。

由于西班牙政府的資助，哥倫布于一四九二年（明弘治五年）發見美洲新大陸。自此以後，西班牙政府在那裏積極經營，分別征服墨西哥（1519）、秘魯（1533）以及其他地方。在太平洋方面，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于一五一九年自西班牙出發，由大西洋經美洲南端入太平洋，于一五二一年航抵菲律賓。其後經過長期間的準備與經營，西班牙的遠征隊，于一五六五年（嘉靖四十四年）自墨西哥出發，終於佔領了菲律賓。（註二）

當歐洲人發見新航路，向海外拓展的時候，羅馬教皇曾經給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劃分在地球上統治的界線，其中規定自歐洲經南非好望角至東方來的航線由葡人獨佔。（註三）在這條航線上，西班牙人既然不能向東方發展，他們只好以墨西哥為根據地來從事菲律賓群島的統治與殖民。同時，西班牙人認為菲律賓是西屬美洲的屏障，他們佔領菲島以後，可以防阻敵人自太平洋方面入侵美洲。

註一：K. S.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New Haven, 1917, pp. 13-15.

註二：陳荆和先生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九龍新亞研究所，民國五十二年，頁八至一七。

註三：同書，頁六至七。

(註四) 在西班牙帝國中，西屬美洲與菲律賓之間既然具有這樣密切的關係，為著加強連繫起見，西班牙政府便每年都派遣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橫渡太平洋，來往于菲律賓馬尼拉與墨西哥阿卡普魯可（Acapulco）之間。在這條航線上的定期航行，自一五六五年開始，至一八一五年為止，一共繼續了二百五十年之久。（註五）因為西班牙商船曾經這樣長時期活躍于太平洋上，故後者有「西班牙湖」（Spanish Lake）之稱。（註六）

可是，位于大帆船航線西端的菲律賓，在十六七世紀間，由于土人文化水準低下，生產落後，既不能供應在菲西人生活上的需要，也沒有什麼重要商品，可以大量輸往美洲。幸而在菲律賓以西，約六百五十英哩至七百英哩左右，便是中國大陸。和菲島比較起來，那裏資源豐富，人口衆多，而且由于過去長期文化的發展，生產技術相當進步，因此，中國各種物產的豐富都遠在菲律賓之上，從而可以大量輸出，以滿足菲島西人的需要。在中國出口的各種貨物中，絲貨（生絲及絲織品）的出口尤其重要，除在菲島消費以外，更自那裏由大帆船轉運往美洲出賣，在菲律賓對美洲輸出總值中每年都要佔最大的百分比。在另外一方面，西班牙人在美洲大規模開採銀礦的結果，除把銀運回本國以外，有不少由大帆船運往菲島，正好作為支付中國商人向菲輸出貨物的代價。這樣一來，在十六七世紀間發展起來的中、菲貿易，便成為墨西哥與菲律賓間大帆船貿易發展的必需條件，同時也成為中國與西屬美洲貿易之重要的一環。因為明（1368—1644）季七八十年間的中、菲貿易具有這樣重大的意義，故我們可以根據中外有關的材料，初步檢討一下。

二

位于中國大陸邊緣的菲律賓，和中國只有一水之隔，故雙方貿易開始的時間

註四：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以下簡稱 *Phil. Isls.*, 55 vols., Cleveland, 1903-09), vol. 45, p. 42;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1939, pp. 244-245.

註五：Schurz, 前引書, p. 15。

註六：同書, pp. 287-302。

並不太晚。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自十二世紀開始，由于宋、金戰爭，宋室南渡，已有大量人口自北向南移徙，集中在那裏居住。到了十三世紀末，光是在福建、浙東沿海狹小區域的人口，多到要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註七）因為這一地區山多田少，過度密集的人口不能完全倚賴農業為生，故自然而然的要「以海為田」，即航海前往國外貿易或移民。中國商人自東南沿海地區出發，菲律賓既然距離較近，自然要成為他們向海外擴展的一個目標。根據宋趙汝适諸蕃志（撰于宋寶慶元年，1225）卷上麻逸國條，及元汪大淵島夷誌畧（約撰于元至正九年，1349）的記載，十三世紀初年至十四世紀中葉之間，中國商船已經往來于麻逸（Mindoro 島）、三嶼（又稱三島，即 Calamian, Palawan 及 Busuanga 諸島）及呂宋島西南海岸諸地。換句話說，他們前往菲律賓貿易，和西班牙人航抵菲島比較起來，在時間上約早三百餘年。（註八）

在西班牙人抵達菲律賓以前，中國商船雖然早已前往貿易，可是要等到十六世紀的六十年代西人佔領菲島的時候，中、菲貿易纔開始大規模發展起來，從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之所以來臨，有三個因素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第一個因素是白銀在太平洋東西兩岸供求情況的不同。中國各地銀礦的蘊藏，為數本來有限，而挖掘出來的礦砂，含銀成分也不很高。經過長期的開採，到了明朝中葉以後，各地銀礦漸漸耗竭，每年產量有長期遞減的趨勢。（註九）可是，明代的白銀，在需要方面却特別增大。明代流通的貨幣，本來以鈔票和銅錢為主。但當日流通的鈔票，因為發行太多，價值不斷低折，結果大家為着保護自己利益起見，都爭着用銀而拒絕用鈔。各地銅錢的使用，由于供應不足，價值

註七：E. A. Kracke, Jr., "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i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4, no. 4, August 1955, pp. 479-488.

註八：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第六卷第二期，頁二六七至三二四；陳荆和前引書，頁一至二。

註九：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書院學術年刊（香港九龍，民國五十六年）第九期，頁二四五至二六七。根據拙著第三表，明代政府自銀礦產額中每年平均收到的銀課，由成祖朝（1402—23）的224,313（十）兩，仁宗朝（1424—25）的106,432兩，宣宗朝（1426—34）的256,450（十）兩，減為英宗朝（1435—53）的46,541（十）兩，憲宗朝（1464—86）的61,913（十）兩，孝宗朝（1487—1504）的54,628（十）兩（包括金課），及武宗朝（1505—20）的32,920兩（包括金課）。

低下而不穩定，也多由白銀代替來流通。銀在中國求過於供的結果，價值自然要特別增大。（註一〇）

當中國白銀在明代因供求失調而價值高昂的時候，在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却由于西班牙人的大規模採煉而銀產額大增。西人于十五六世紀間抵達新大陸以後，在那裏發見儲藏豐富的銀礦，于是從事大規模的開採。其中光是秘魯南部（Upper Peru，今屬 Bolivia）的波多西（Potosi）銀礦，于一五八一至一六〇〇年每年平均產銀 254,000 公斤，約佔世界產額百分之六十多點；（註一一）及一六二四至一六三四年，每年平均產銀 5,232,425 西班牙銀元（pesos，以下簡稱西元）。自一五四五年這個銀礦在一萬六千餘英呎的高山上被人發現以後，至一七八九年，約共生產價值 234,693,840 鎊的銀子。（註一二）經過長時期的開採，這個銀礦後來漸漸耗竭，產量減少，但從十七世紀末葉開始，墨西哥銀礦又起而代之，產量激劇增加，成為全世界產銀最多的地方。牠的產量，在十八世紀約增五倍，到了一七八九年每年平均產量約為全世界銀產總額的八分之五以上。（註一三）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因為有銀產豐富的西屬美洲做他們的後盾，當和把白銀視為至寶的中國商人貿易的時候，購買力便非常之大，從而引起中國商人擴展中、非貿易的興趣。根據十七世紀一位意大利旅行家的記載，中國皇帝曾經稱呼西班牙國王為「白銀之王」（King of Silver）。（註一四）這一件事，我在中國文獻中一時還沒有找到相似的記載，但這至少表示出，當日前往菲島貿易的中國商人，看見

註一〇：拙著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新亞學報（香港九龍新亞書院，1967）第八卷第一期，頁一五七至一八六。

註一一：A. Kobata, "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vol. XVIII, no. 2, August 1965, p. 247。根據此文，一五八一至一六〇〇年，世界每年平均銀產額為 418,900 公斤，故在這個時期內波多西每年平均銀產額為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多點。

註一二：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

註一三：A. V. Judges, "Money, Finance, and Bank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dward Eyre, ed., *European Civilizatio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37, vol. V, p. 407.

註一四：Schurz, 前引書，p. 63.

西班牙人手中持有那麼多的銀子，興趣非常之大，因此自然而然的要努力發展對菲貿易，以便把西人自美洲運來的銀子，賺回中國使用。

第二個因素是明代政府對於國外貿易管制的放寬。明初政府採取的國外貿易政策，以懷柔外國及防禦海寇——尤其是倭寇——為目的。因為要懷柔外國，故在寧波、泉州和廣州設立「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以管理各國使臣的朝貢和對外貿易。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Champa，在印度支那半島，即今越南中圻）、暹羅、南洋諸國。這些市舶司分別在浙江設安遠驛，福建設來遠驛，廣東設懷遠驛，以作招待外國使臣之用。各國商人如果要來中國貿易，他們可以利用朝貢方式來進行，即每隔兩三年，或甚至十年（例如日本），由各國政府派遣使臣來華，向明廷朝貢。他們駛抵中國的貢舶，除運載進貢方物以外，又輸入大量的貨物，名曰「附來貨物」，在市舶司所在地的廣州、泉州或寧波出售；或把牠轉運往首都，于使臣向皇帝朝貢以後，在會同館（在首都的外賓招待所）與中國商人開市互易。明朝政府對外國使臣進貢的方物，例有回賜，同時為懷柔遠人起見，對外國商品的輸入，不再徵收關稅。（註一五）這種朝貢貿易制度，偏重于對外人來華貿易的管理。復次，隨着海洋交通的發展，到了明代，中國沿海常有海寇——尤其是倭寇——的騷擾，國防漸漸開始發生問題。可是，和海防比較起來，明初北方的邊防更為吃緊。原來自從元朝滅亡以後，蒙古軍隊雖然被迫撤離中國，但仍然據有漠北，構成對明室政權的嚴重威脅。明初政府既然要忙于維護北方邊境的安全，對於騷擾東南沿海的倭寇只好採取一種消極的政策。這種政策稱為「海禁」，即禁止本國人民航海私往諸番國互市，及嚴格管制出口的貨品。（註一六）

明朝政府對於國外貿易過度統制的政策，事實上中外商人都沒有切實遵行。外國商人中，尤其是日本商人，對於明成祖（1403—24）規定十年一貢，即每隔十年纔准派遣貢船來華貿易一次的辦法，當然感到不便。（註一七）在中國方面，

註一五：明史（百衲本）卷八一，頁二二，食貨志；梁方仲前引文。

註一六：梁方仲前引文。

註一七：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北京，一九五七，頁一六四至一六五。

到了明朝中葉左右，許多地方的工業生產都突飛猛進，產量增加，（註十八）除在本國出售以外，有輸往海外，開闢國外市場的必要。（註一九）同時，在東南沿海區域繁殖起來的大量人口，因為耕地有限，單靠農業不能養活，不得不就近利用海洋交通的便利，前往海外貿易，以解決生計問題。（註二〇）因此他們常常乘船出海，私往各番國做買賣，或與外商——尤其是日本人——互相勾結，在東南沿

註一八：以絲織業為例，江蘇南部的吳江縣，在洪武二年(1369)種桑18,033株，到了宣德七年(1432)增加至44,746株，（陳襄纒等修乾隆吳江縣志卷五，頁一〇下）為明初的兩倍有多。桑樹種的多了，蠶絲產量便跟着增加，從而刺激絲織業的發展。吳江縣的盛澤鎮，「明初(1368)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1522—66)間倍之，以綾、紬為業，始稱為市。」（同書卷四，頁一至二；又參攷仲虎騰修光緒盛湖志補卷一，頁一。）就整個吳江縣來說，「綾、紬之業，宋、元以前，惟郡人為之。至明（洪）熙(1425)、宣(德, 1426—35)間，邑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雇郡人織挽。成(化, 1465—87)、弘(治, 1488—1505)以後，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於是盛澤、黃溪四五十里間，居民乃盡逐綾、紬之利。有力者雇人織挽，貧者皆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紡績，日夕治絲。故兒女自十歲以外，皆蚤暮拮据，以餬其口。而絲之豐歉，綾、綢價之低昂，即小民有歲無歲之分也。」此外，關於明代其他工業發展情況，參考吳晗明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歷史研究(科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五，第三期，頁五三至八三。

註一九：在明朝以前，以宋代(960—1279)為例，中國對外貿易的出口貨，只限於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及瓷器。（宋史，百衲本，卷一八六，頁一九，食貨志。）其後，到了明朝中葉左右，出口工業品的種類、數量，都較前大增。當日浙江、江西、福建及江蘇的各種工業製品，單是在日本一國，因為能夠滿足社會大眾的消費需要，銷路已經很大。例如明姚士麟見只編(叢書集成本)卷上，頁五〇至五二說：「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州)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州)之磁器，湖(州)之絲、綿，漳(州)之紗、絹，松(江)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海商至彼，則必以貨投島主。島主猶中國郡縣官。先以少物為贄。……其貨悉島主議之，低昂既定，然後發市，售價更不易也。」

註二〇：徐孚遠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台北市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影印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第二四冊(卷四〇〇)，頁六二八至六二九，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撰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參考和田清編明史食貨志譯註，東京東洋文庫，1957，下卷，頁九〇八）說：「東南濱海之地，以販海為生，其來已久，而閩為甚。閩之福(州)、興(化)、泉(州)、漳(州)，襟山帶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濤而輕生死，亦其習使然，而漳為甚。」又同書第二六冊(卷四三三)，頁六三三，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上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參考明史卷三二三，頁一四，呂宋傳）說：「漳、泉濱海居民，鮮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漁，乃其生業，往往多至越販諸番，以窺厚利。」

海從事大規模的走私貿易。(註二一)

明中葉前後國內外商人對於政府嚴格管制國際貿易的反抗，自十五六世紀之交歐人東來以後，勢力更爲雄厚。葡萄牙人于弘治十一年(1498)航海經好望角到達印度西岸，于正德十一年(1516)駕船抵達廣州，此後繼續不斷在廣東、福建、浙江沿海要求互市。再晚一些，其他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荷蘭的勢力，也伸展到東方來。這些歐洲國家的商人，挾有強有力的組織和雄厚的資本，當然不像過去南洋諸國那樣肯屈居臣屬的地位，往往用武力強迫中國互市，或勾引作內應叛亂，弄到中國沒有辦法，只好多開口岸來滿足他們通商的要求。在廣東方面，廣州的市舶司，大約因爲要防禦倭寇，曾經在正德年間(1506—21)移往高州府電白縣。及嘉靖十四年(1535)，指揮黃慶受賄(多半是受葡人的賄賂)，再把市舶司移往濠鏡(又稱濠鏡澳，即澳門)，葡人便乘機到那裏從事貿易。其後到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人更正式得到中國官方許可，歲輸地租銀五百兩，獲准

註二一：張燮東西洋考(成於萬曆四十五年，惜陰軒叢書本)卷七，頁一，餉稅攷說：「成(化，1465—87)、弘(治，1488—1505)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權，……漸享奇贏，……至嘉靖(1522—66)而弊極矣。」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一三冊(卷二〇五)，頁七一七，朱執雙嶼填港工完事(約撰於嘉靖二十六年，參考明史卷二〇五，頁一，朱執傳)說：「浙江定海雙嶼港，乃海洋天險。叛賊糾引外夷深結巢穴，名則市販，實則劫虜。有等嗜利無恥之徒，交通接濟。有力者自出貲本；無力者轉展稱貸。……雙桅三桅，連樁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磚，率得厚利。馴致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爲衣食父母，……」又同書第一八冊(卷二八三)，頁五九至六〇，王忬倭夷容留叛逆糾結入寇疏(約撰於嘉靖三十一年，參考明史卷二〇四，頁一九，王忬傳)說：「我朝備倭，北自山東，南抵閩、廣，……且嚴通番下海之禁，明十年一貢之規。……但數十年來，事皆廢弛。番商海寇，俱至浙洋。寧(波)、紹(興)、蘇(州)、杭(州)奸究射利之徒，接濟交通，勾引貿易。自嘉靖二年(1523)……之後，……閩、廣、徽、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巨室爲之隱護，……」又同書第一七冊(卷二六七)，頁一七〇至一七一，胡宗憲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約撰於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六年間，參考明史卷二一五，頁八至一一，胡宗憲傳)說：「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州)、潮(州)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參考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六本(台北，民國五十四年)，頁三七五至四一八。

在那裏築屋居住及存貯貨物。(註二二)在福建方面，漳州府的月港，由于海道交通的方便，在海禁期內早已成為走私貿易的中心，許多人都從那裏私自出洋，前往呂宋諸島做買賣。(註二三)月港既然因走私貿易而繁榮到有「小蘇、杭」之稱，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當地政府官員便依照人民的請求，建議把牠升級為縣。其後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政府終於承認既成事實，把月港改為漳州府海澄縣治。第二年，即隆慶元年(1567)，更正式開放海禁，准人民自那裏航海前往東洋、西洋貿易，(註二四)而由海防同知徵收引稅(向商船徵收)及關稅。(註二五)

第三個因素是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時對於中國貨物的倚賴。當西人剛剛佔領菲律賓的時候，「菲島經濟雖已脫離原始粗笨之產業階段……，但其生產仍未足以應付西班牙之殖民地經營所需要之消費。于是遠離本國之西人，不得不將所需

註二二：明史卷三二五，頁一九至二三，佛郎機傳；梁方仲前引文；李劍農前引書，頁一七二至一七四。

註二三：梁兆陽等修海澄縣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卷一五，頁二，風土說：「饒心計者，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耒耜。蓋富家以財，貧人以驅，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樂經生，鼓柁相續，亦既習慣。……成(化，1465—87)、宏(弘治，1488—1505)之際，稱「小蘇、杭」者，非月港乎？」又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文海出版社印行)卷八三，頁二四，姜宸英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擬稿說：「所謂商舶，乃西洋貢使載貨至廣東之私澳，官稅而市之民。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閩人導之改泊海倉、月港，……」

註二四：沈均定等增修漳州府志(光緒三年，1877)卷四四，頁三四下，呂晏新建海澄縣城碑記說：「海澄，舊月港也。……一水中壑，回環如偃月，……自昔號為巨鎮。顧其地濱海，潮汐吐納，舳舻鱗集。遊業奇民，捐生競利，滅沒風濤，少低梧，輒按劍相視，剽悍成俗，莫可禁遏。當道者憂之。嘉靖戊申(二十七年，1548)，中丞秋厓朱公循百姓之請，疏立邑於茲土。……既報可，海澄乃得自為縣，時嘉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歲也。」又東西洋攷卷七，頁二說：「(嘉靖)四十四年(1565)，奏設海澄縣治。其明年，隆慶改元(1567)，福建巡撫塗澤民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四冊(卷四〇〇)，頁六二九至六三〇，許孚遠疏通海禁疏說：「隆慶初年(1567)，前任撫巨塗澤民，……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通東、西二洋，……奉旨允行。」按東洋及西洋的劃分，以婆羅洲(Borneo)北岸的文萊(Brunei)為界，文萊以東，以菲律賓為中心的海洋叫東洋，以西叫西洋。明史卷三二二，頁一八，婆羅傳說：「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

註二五：何喬遠閩書(明刊本)卷三一九，頁三四說：「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置福州，而比歲人民往往入番商呂宋國矣。其稅則在漳之海澄，海防同知掌之。」

物資之供應仰賴于菲島近鄰之地。此實為我國商賈之菲島貿易突飛猛進之客觀原因。」(註二六)中國向菲島輸出的貨物，最重要的大約有三類，即(1)糧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2)軍需品，及(3)絲貨，都和西人保存菲島有密切的關係。關於第一類，陳荆和先生說：「至于華賈為與西人貿易而載來之商貨，……其種類頗多，包括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同時亦可推想西人在菲島生活之各方面均仰賴于華船之來航。致使莫伽(Antonio de Morga)曾發出如下感慨：倘無中、菲間之貿易，菲島則無法維持！」(註二七)復次，西人佔領菲島後，一方面必須經常防禦外來敵人的侵襲，他方面又須鎮壓各島土人的叛亂，因此對於各種軍需品的需要非常之大。可是，菲島和他們在美洲的基地距離很遠，接濟不易，故有賴于中國商人的輸入，以維護菲島的安全。(註二八)此外，菲島資源有限，而且尚未開發，並沒有什麼重要產品，可以由大帆船大量運往美洲出售獲利。因此，「中國往往是大帆船貿易貨物的主要來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廣大地區)的人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作為大帆船貿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國絲貨，都以牠為集散地而橫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當無拘無束的談及菲律賓的時候，有如談及中華帝國

註二六：陳荆和前引書，頁四。

註二七：同書，頁四至五。按莫伽(Morga)於一五九五至一六〇三年在菲任最高法院院長及代理總督，參攷 Schurz，前引書，pp. 31, 67.

註二八：當隆慶元年(1567)中國政府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時，本來規定「禁不得以硝(石)、黃(硫磺)、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四冊，頁六二九至六三〇，許孚遠疏通海禁疏)可是，事實上，這項禁令似乎沒有切實執行，因為在十六七世紀間菲律賓輸入中國貨物中，有鋼、鐵、鉛、錫、硝石、火藥、銅鐵及其他軍需品。(陳荆和前引書，頁五及五六；Antonio de Morg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Moluccas, Siam, Cambod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pp. 337-339; "Letter from Juan Pacheco Maldonado to Felipe II" (1575?), *Phil. Isls.*, vol. 3, p. 299.)關於此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雅書局本)卷九六，頁九，沈鐵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澎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也說：「一夥豪右奸民，倚藉勢官，結納游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賣文引，載貨物出外海，徑往……呂宋等夷買賣覓利，中以硝、磺、器械違禁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食也。」(秦炯纂詔安縣志卷一二，頁一三下至一四，沈鐵上南撫臺經營澎湖六策書畧同。)

的一省那樣。就馬尼拉方面說，每年航經中國海到達的商船，着實是牠的繁榮的基礎。」(註二九)

由此可知，在明季七十餘年的期間內，中國與菲律賓間貿易之大規模的發展，並不是偶然，而是有牠的歷史背景的。牠的發展，表示中、菲對各種物產供需的不同，而有互通有無的必要。中國到了明代，因為白銀普遍用作貨幣，需要大增，而本國銀礦生產不能滿足需要，故亟須對菲輸出大量貨物，以換取西班牙人自美洲運來的銀子。在另外一方面，到菲律賓從事殖民事業的西班牙人，因為和美洲基地距離太遠，而菲島物產有限，又不能滿足需要，故不得不倚賴中國貨物的輸入。恰巧在西人抵達菲島的前後，明朝政府對於國外貿易的管制，由於客觀形勢的要求，不得不予以放寬。這些因素交互發生作用的結果，自十六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中、菲貿易遂向前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三

當西班牙人抵達菲律賓，在那裏與中國商人交易的時候，他們發見自中國運來的各種貨物，售價都非常低廉。在一五七五年左右，有一位西班牙官員自馬尼拉寫信給國王腓力伯二世 (Felipe II)，談及自中國輸入各種貨物的時候，說「各種貨物的價格，低廉到幾乎等於不用貨幣購買那樣。」(註三〇) 在一五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菲律賓總督維拉 (Santiago de Vera)，自馬尼拉給國王腓力伯二世上書說：「他們(中國商人)把各種貨物賣得這樣便宜，以致我們只好作這樣的想法，要不是在他們國家裏不需要什麼勞力來生產這些東西，那便是他們不用花費什麼本錢便可得到這些東西。」(註三一)

這是不難瞭解的。和菲律賓比較起來，中國資源豐富，人口衆多，技術進步，故各種貨物的生產成本都要低廉得多。不獨如此，在明代的中國，普遍作為

註二九：Schurz，前引書，p. 63.

註三〇：“Letter from Juan Pacheco Maldonado to Felipe II” (1575?), *Phil. Isls.*, vol. 3, p. 299.

註三一：Santiago de Vera, “Letter to Felipe” (Manila, June 26, 1587), *Phil. Isls.*, vol.6, p. 302.

貨幣來流通的白銀，因為求過于供，價值高昂，故以銀表示的物價水準更為低下。至于在非殖民的西班牙人，他們來自銀產豐富，銀被人看成像街上的石頭那樣低賤（註三二）的美洲，本來習慣生活于高物價水準的社會中。怪不得他們在抵達菲島，與中國商人交易的時候，要特別驚訝中國各種貨物價格的低廉了。

儘管從西班牙人的眼光中看來，在菲律賓市場上中國貨物的售價是這樣便宜，事實上這些貨物在菲出賣的價格要比在本國高昂得多，（註三三）故從事中、菲貿易，利潤非常之大。一五九〇年，有一位西班牙主教在馬尼拉報導說：「因為在中國市場上各種貨物的售價都非常低廉，故不管他們（中國商人）在那裏獲利如何微薄，當把貨物運到這裏出賣的時候，他們便都獲得鉅額的利潤。」（註三四）由于鉅額利潤的吸引，中國商人自然要努力發展中、菲貿易了。（註三五）

關於十六七世紀間中、菲貿易發展情況，我們首先可以根據福建漳州府海澄

註三二：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

註三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光緒九年刊）卷四二，頁三五，載崇禎十二年（1639）給事中傅元初論開洋禁疏說：「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兩夷（指東洋及西洋）者，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州）絲百斤，值銀百兩，若（一作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又見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頁二九至三〇，郭造卿防閩山寇議，及黃叔儼倭臺海使槎錄，叢書集成本，卷二，頁四二至四三。）

註三四：Domingo de Salazar,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án at Manila" (June 24, 1590), *Phil. Isls.*, vol. 7, p. 225. 又閩書卷三一九，頁三四說：「民初販呂宋，得利數倍。其後四方買客叢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絕也。」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八冊（卷四六〇），頁三三六，李廷機報徐石樓（約撰於萬曆三十一年，參考明史卷二一七，頁三，李廷機傳）說：「弟生長海陬，少時嘗見海禁甚嚴。及倭訖後，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稅以饑兵。……而所通乃呂宋諸番，每以賤惡什物，質其銀錢，滿載而歸，往往致富。」又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中央書店刊）卷四，頁一四四至一四五說：「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旅（呂）宋，……彼此互市，若比隣然。……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為奇貨。」又雲間雜誌（明華亭撰人闕，奇晉齋叢書本）卷中，頁二〇下說：「近來中國人都從海外商販至呂宋地方，獲利不貲。松（江）人亦往往從之。萬曆三十七年（1609）……」

註三五：例如上引閩書說販呂宋的人民，後來雖然因為買客叢集而不得厚利，仍然「往者不絕。」又五雜俎說赴呂宋貿易的「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為奇貨。」

縣的餉稅（又稱船稅，或洋稅）收入，來加以攷察。上文說過，因走私貿易而發展起來的漳州月港，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陞為海澄縣治，並於第二年，即隆慶元年（1567），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海禁開後，政府規定，凡華船下番，于出口前應先請引，同時繳銷。請引時須繳納一種特許金，名曰引稅。除此以外，政府又徵收三種具有關稅性質的稅：（1）水餉；（2）陸餉；（3）加增餉。水餉相當于今日海關徵收的船鈔（Tonnage dues），由船商繳納，稅率「以船廣狹為準」，即按照船的容積量的大小來徵收。陸餉就是貨物進口稅，「以貨多寡計值徵輸，其餉出于鋪商。又慮間有藏匿，禁船商無先起貨，以鋪商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餉，而後聽其轉運。」此外，加增餉是一種特加稅，專向自菲律賓回來的船舶來課徵。因為「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携來，即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澳，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稅。後諸商苦難，萬曆十八年（1590）量減至百二十兩。」（註三六）以上各種稅收，漳州府海澄縣在明季數十年中，每年收到的款項，約如第一表所述。

第一表 明季漳州海澄每年餉稅收入

年 代	每年餉稅收入（單位：兩）
<u>隆慶</u> 年間（1567—72）	3,000
<u>萬曆</u> 初（1573）	6,000
<u>萬曆</u> 四年（1576）	10,000
<u>萬曆</u> 十一年（1583）	20,000（+）
<u>萬曆</u> 二十二年（1594）	29,000（+）
<u>萬曆</u> 二十七年（1599）後	27,000（+）
<u>萬曆</u> 四十三年（1615）	23,400
<u>崇禎</u> 元年（1628）	23,400

註三六：東西洋考卷七，頁二至三；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頁二一下至二二，洋稅。

資料來源：東西洋考卷七，頁二至五及頁一一；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戊編第一本，頁四下，兵部題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撫朱題」稿（崇禎元年二月十三日）。又參考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頁二一下至二二；皇朝經世文編卷八三，頁二五下至二六，姜宸英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擬稿；周凱等修廈門志（道光十二年序）卷七，頁二；陳壽祺等纂福建通志（同治七年版）卷二七〇，頁八下。

自隆慶元年（1567）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後，由漳州海澄出發的商船，並不以販東洋呂宋為限。可是，因為菲律賓群島中的呂宋島，和漳州海澄距離較近，交通較便，後者的對外貿易，顯然以呂宋為主要對象。因此，第一表記載的海澄餉稅收入，很可能大部分與中、菲貿易有關。假如這種判斷沒有多大錯誤的話，我們便可根據那裏歷年餉稅收入數額，來推想明季數十年中、菲貿易的發展情況。根據第一表，我們可知，海澄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的餉稅收入，增加到將近等于二十餘年前的十倍，其後稍為減少，但也為隆慶年間（1567—72）每年平均收入的八倍上下。由此可以推知，漳州海澄與菲律賓間的貿易，在隆慶元年以後的數十年內，大約增加八至十倍左右。

除漳州以外，廣東對外貿易發展的歷史更為長久。據萬曆三十年（1602）刊的廣東通志所載，廣東市舶提舉司收入的船稅，據該司揭稱每年約餉銀四萬餘兩。（註三七）自然，這些餉銀並不全部與中、菲貿易有關，不過當日閩、粵商人經常來往于呂宋、廣州之間從事貿易，（註三八）故自這種貿易課徵到的餉銀可能要佔其中相當大的百分比。

以上我們參考中國的記載來研究明季數十年間中、菲貿易發展情況。復次，對於這個時期的中、菲貿易，我們又可根據菲律賓方面的紀錄來加以攷察。菲律賓的港口馬尼拉，在十六七世紀間，每年除由墨西哥開來大帆船兩艘（有時三艘）以外，其進港船舶數量，約如第二表所述。

註三七：廣東通志（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卷七，藩省志七，稅課；卷六九，番夷。原書未見，茲引自梁方仲前引文。

註三八：屈大均（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廣東新語（康熙三十九年刊）卷一五，頁五下至六，貨語說：「閩、粵銀多從番船而來。番有呂宋者，在閩海南，產銀，其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粵人多買呂宋銀至廣東。攬頭者就舶取之，分散於百工之肆；百工各為服、食、器物償其值。……」

第二表 十六世紀間馬尼拉每年進港船數(註三九)

年代	總數	中國船數	來自中國大陸船數	來自澳門船數	來自台灣船數
1577	15	9	9		
1578	33	9	9		
1580	50	21	19	2	
1581	?	9	9		
1582	?	24	24		
1588	?	48	46	2	
1591	?	21	21		
1596	?	40	40		
1597	?	14	14		
1599	29	19	19		
1600	30	25	25		
1601	33	29	29		
1602	21	18	18		
1603	?	16	16		
1604	26	20	20	5	
1605	23	20	15	2	
1606	30	27	18	1	
1607	42	39	26		
1608	?	39	39		
1609	44	41	41		
1610	?	41	41		

年代	總數	中國船數	來自中國大陸船數	來自澳門船數	來自台灣船數
1611	?	21	21		
1612	53	28	46		
1620	41	28	23		
1627	33	28	21	5	
1628	17	12	9	6	
1629	15	6	2	2	
1630		27	16	6	
1631	46	39	33	3	
1632	32	22	16	4	
1633	36	34	30	3	
1634	37	29	26	4	
1635	49	47	40	1	
1636	36	32	30	3	
1637	57	54	50	3	
1638	20	20	16	4	
1639	39	37	30	3	
1640	11	11	7	3	
1641	16	11	8	2	
1642	41	36	34	1	
1643	32	30	30		
1644	12	9	8		

資料來源：Pierre Chan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eriques*, Paris, 1960, pp. 148—160. 本書由美國 Kansas 大學魏安國 (Edgar Wickberg) 教授遠道寄贈，謹此誌謝！

註三九：除表中所列菲律賓記載歷年抵達馬尼拉的船數以外，另據荷蘭文獻的記載，抵達馬尼拉的中國船數，在一六一五年為20—30艘，一六二二年為8艘，一六二五年為30—50艘（自20噸至100噸的小船），一六二六年為100艘（小船），一六三一年為70—80艘。(Ts'ao Yung-ho, "Chinese Overseas Trade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i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Taipei, 1962, p. 444.) 頭四年的船數，可補表中的不足；一六三一年的船數，與表中的數字不符，可能因為是估計的原故。(同書，p. 434.)

根據第二表，我們可知在明季數十年中，每年開抵馬尼拉港的船舶，除自墨西哥航來的大帆船以外，中國商船要佔絕大多數，有時甚至要等於進港船數的全部。

在十六七世紀間每年抵達馬尼拉的船隻，既然大部分都是中國商船，菲律賓的入口貨物自然以來自中國為主了。關於此點，我們可以根據馬尼拉海關每年向中國貨物課徵的入口稅額，及其在入口稅總額中所佔的百分比，來加以考察。請看第三表。

第三表 十六七世紀間馬尼拉每年平均徵收的入口稅
(單位：西元)

年 代	入口稅總額	向華貨課徵的入口稅	華貨入口稅在入口稅總額中所佔的百分比
1586—90	13,383	4,909	36.68
1591—95	36,155.5	22,065	61
1596—1600	43,104.5	24,155.5	56.04
1601—05	42,982.9	30,304.2	70.5
1606—10	59,066	46,390.6	78.52
1611—15	70,355	64,482	91.5
1616—20	51,337	37,843	73.5
1626—30	25,720	18,623.5	72.4
1631—35	42,194	34,283.8	81.1
1636—40	31,037	27,483.8	88.6
1641—42	31,425	28,930	92.06
1641—45	22,075	18,599.4	84.06

資料來源：Chaunu，前引書，pp. 200—205. 按表中所列由馬尼拉海關課徵入口稅的中國貨物，大部份來自中國大陸各港口，小部份來自澳門（但1641—42年例外）及台灣。

根據第三表，可知在十六七世紀之交的數十年內，馬尼拉海關向中國貨物課徵的入口稅，在入口稅總額中每年都佔很高的百分比，有時高至百分之九十以

上。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在馬尼拉每年輸入外國貨物的總值中，中國貨物價值所佔的百分比，一定非常之大。不特如此，輸入菲律賓的中國貨物，並不都要繳納關稅，例如糧食（甚至各種食物）、軍需品等的輸入，自一五八九年起都得到免稅的優待。（註四〇）而這些貨物，和菲島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及軍事上的防衛都有密切關係，輸入量可能很大。因此，如果把這些免稅進口的貨物也包括在內，價值當然更大了。

復次，馬尼拉海關因華貨輸入而徵收到的關稅，依照第三表所述，在一五八六至九〇年每年平均為 4,909 西元，及一六一一至一五年增加到 64,482 西元，為二十餘年前的十三倍有多。其後華貨入口稅額雖然下降，但都遠較一五八六至九〇年為高。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到，在十六七世紀間，中國貨物在菲律賓擴展市場的速度着實很快。

此外，根據當日馬尼拉海關向華貨課徵到的入口稅額，我們又可約略估計出這個港口每年輸入華貨的價值。曾經于一五九五至一六〇三年在菲律賓服務的莫伽(Antonio de Morga)，于一六〇九年在墨西哥發表一本有關菲律賓的著作，內說：「向中國商船輸入華貨課徵的百分之三的入口稅，每年平均收入四萬西元。」（註四一）這可能指的是十七世紀初期的情形。由此推算，我們可以知道，菲律賓每年自中國輸入貨物的價值，除免稅物品以外，約為 1,333,333 西元。（註四二）

註四〇：一五八九年八月九日，西班牙國王腓力伯二世向菲律賓總督訓令說：「該城市（馬尼拉）會請朕下令，准自外國前往菲島各港貿易的人——例如中國人、葡萄牙人、日本人、暹羅人、緬甸人，及其他國家人民——免繳入口稅，尤其對於食物、軍需品及製造軍需品的原料的輸入，更應如此。因為對這些物品課稅以後，常常發生騷擾（例如對中國商人的騷擾），以致正常貿易途徑受阻，從而其他麻煩也跟着到來。在聽取桑哲士（Alonso Sanchez）神父的詳細報告以後，朕認為對糧食及軍需品的入口稅應予以取消，因此汝須立即停止徵收這些入口稅，直至朕再有其他決定為止。」（“Instructions to Gomez Perez Dasmariñas,” August 9, 1589, in *Phil. Isls.*, vol. 7, p. 147.）又在同日頒布的法令說：「茲規定中國人、日本人、暹羅人、婆羅洲人，及其他外國人，凡向菲律賓各港口輸入食物、軍需品，及製造軍需品的原料，均免納關稅。」（同書，vol. 16, p. 181, footnote.）又參考陳荆和前引書，頁六一至六四。

註四一：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exico, 1609), *Phil. Isls.*, vol. 16, p. 191.

註四二：Bal Krishna,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England (1601 to 1757)*, London, 1924, p. 34.

這種百分之三的入口稅率，依據一六〇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頒布的法令，增加到百分之六。（註四三）但這種新稅率究竟實行多久，一時找不到記載，故不便把第三表所述各年華貨入口稅額都折算成華貨入口價值。

四

在十五六世紀之交歐人向外拓展運動聲中，哥倫布自西班牙向西航海，發見了美洲新大陸，後來西班牙人更由美洲再向西航海，佔領了菲律賓。當菲律賓與美洲共同隸屬於西班牙帝國之內，太平洋成爲西班牙湖的時候，中國向海外尋求發展的商人，以及在菲殖民的西班牙人，因爲雙方對各種物產的供給與需要各有不同，大家都感覺到互通有無的必要，因而共同把中、菲貿易發展起來。

中、菲貿易的發展，使中、西兩方各蒙其利。中國的工業品及農產品在菲擴展銷路的結果，使國內的工農業者能夠爲國外市場而生產，商人能夠爲國外貿易而服務，無形中增加不少就業的機會，從而有助於國內過剩人口的生計問題的解決。而中國商人向菲大量輸出，賺取西班牙人自美運菲的銀子，使牠源源流入中國，滿足明中葉以後因普遍用銀作貨幣而起的對於銀的大量需求。

在西班牙人方面，中、菲貿易的發展，使菲律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得到充分的供應，同時菲島防務所亟需的各種軍需品也因此而得到補給。不特如此，以馬尼拉爲轉運中心，中國絲貨大量運銷于西屬美洲，使太平洋上的大帆船貿易有利可圖，從而加強了美洲基地與菲律賓間的連繫。

由此看來，在十六七世紀間的中、菲貿易，既然互有利益，可說是在當日客觀形勢下，中、西雙方都深切感覺到互通有無的迫切需要，而共同努力發展起來的。可是，儘管中、西雙方在經濟上需要這樣密切的互相倚賴，這兩個民族在菲律賓交互接觸以後，並不能長期保持和諧友好的關係。當中、菲貿易開展，前往菲律賓經商謀生的華人數目激增以後，雙方便常常發生嚴重衝突。在萬曆二十一

註四三：在一六〇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頒布的法令說：「茲規定中國人向菲島輸入貨物所納的百分之三的關稅，再增加百分之三。」(Phil. Isls., vol. 16, p.182, footnote.)參考陳荆和前引書，頁一四二。

年(1593)，菲律賓總督及其部屬，于遠征摩鹿加（一作美洛居，Moluccas）途中，為華人潘和五等所殺。萬曆三十一年（1603），馬尼拉華僑暴動，被西人殺死二萬餘人。其後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中、西雙方又復在菲衝突，各有傷亡，被殺的華僑也超過二萬人。（註四四）每次不愉快事件發生以後，中、菲貿易在短期內當然不免蒙受影響，但在客觀形勢下中、西雙方既然都感覺到互通有無的必要，不久以後中、菲貿易又復照常進行了。

由于中、菲貿易的發展，再加上墨西哥與馬尼拉間的大帆船貿易，美洲白銀與中國絲貨，自十六世紀最後的三分之一時間開始，便長期交流于太平洋東西兩岸。由此可見，美洲新大陸發見的影響，並不限于西班牙一國，而是具有世界性的，連遠隔太平洋的中國，在經濟上也大受影響。不過，關於這些問題，因為篇幅所限，恕作者不在本文詳細論述了。

一九六八年正月三日，香港九龍。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A Summary)

HAN-SHENG CHUAN


I

China and America had been trading with one another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first American ship, the *Empress of China*, set sail in 1784 from New York, via the Cape of Good Hope, for Canton.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the Spaniards soon conquered Mexico, and by 1533 they had annexed Peru and other parts of the America. After Ferdinand Magellan landed on the island of Cebu in 1521,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about four and a half decades, before the Spaniards also occupied the Philippine islands.

Ocean routes between Europe and the Orient were still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ortuguese, with the Pope's blessing, and the Spaniards had to remain content with a sphere of influence limited to the expanse of the Pacific that lay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Mexico. In order to maintain political ties between the two areas, the Spaniards operated regular shipping services. For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two or three galleons each year made the long voyage between Acapulco in Mexico and Manila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part of the Pacific could be justifiably called a Spanish lake.

On the Philippine end of the travel route, the economy was exceedingly backward and resources greatly undeveloped. The island's inhabitants were unable to offer consumer goods or raw materials which appealed to the trading appetites of the Spaniards. However, to the west of the Philippines some 700 miles away, lay China, more developed in the production of necessities and luxury goods and possessed of a large work force of skilled craftsmen.

Chinese trader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gradually became interested in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commodities such as silk began to find



a ready market with the Spaniards. Trade picked up when Chinese traders found that the Spaniards were willing to exchange large quantities of silver for silk. The widespread use of silver for 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China had always depended on the sufficient supply of that bullion. When the Chinese found they could buy large quantities of silver, trad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quickly increased and soon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the expanding commercial network in the Pacific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hinese vessels had been sailing to the Philippines for over thre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the islands. However, trade had been restricted to a very low level because of the inability of the natives to offer goods which Chinese merchants regarded as sufficiently valuable to buy in large quantities. After the Spaniards arrived, conditions quickly changed and trade with China accelerated.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explain this expansion.

The first factor was the rising demand for silver in China. Paper money had been in wide use since the tenth century. Even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or the later fourteenth century, paper money continued to flourish as the government increased its issue in order to cover its financial deficits. As the quantity of paper notes increased, people lost faith in its purchasing power, and the velocity of note circulation rose greatly. Consumers and merchants gradually rejected these paper notes in favor of silver which was regarded as a more reliable unit of account and medium of exchange. There were few good silver mines in China and the output of silver failed to keep pace with demand. By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rice of silver had risen to a very high level.

Meanwhile, silver output in South America had increased greatly. In 1545 the rich silver mine in Potosi of upper Peru (present-day Bolivia), located on a mountain more than 16,000 feet high, had been discovered. The average annual output from this mine between 1586 and 1600 was 254,000 kg. or roughly a little over 60 per cent of the world output. Between 1624 and 1634 the average annual output was valued at 5,232,425

pesos. The total output from the year of discovery to 1789 was estimated at a value of £234,693,840 sterling. As time went on, the silver output in Potosi began to diminish when the mine was getting exhausted, but from the later yea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exico became a primary world producer of silver. The supply of silver from Spanish America gave the Spaniards an important commodity for the Philippine trade, one which Chinese merchants valued greatly. Conditions were now appropriate for Chinese merchants to promote the export trade to the Philippines.

A second factor accounting for trade expansion was the relaxing of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trade. Its main objective was to treat the people of the tributary states kindly in order to win their hearts, and to avoid violent encounters with Japanese pirates. The ships of the tributary states were permitted to enter China's ports, exempt from import duties, but this tributary trade had many restrictions concerning terms of tribute, numbers of ships, etc. Private merchant ships were not permitted to sail abroad in order to avoid contact with Japanese pirates. Exports were strictly controlled. Throughout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more heavily populated coastal centers suffered under these trade restrictions. In Fukien province where land was scarce and the large population was unable to live from agriculture, many left their villages to engage in smuggling.

It was only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and other Europeans on the China coast seeking trade that the Ming government decided to reverse its former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The Portuguese were permitted to settle in Macao in 1557 and an important trading post was soon established. The Court in 1567 designated Chang-chou in Fukien as a port from which Chinese merchants were permitted to sail abroad for purposes of trade.

The final factor encouraging Sino-Filipino trade expansion was that the Spaniards eagerly sought the merchandise produced in China. At first the Spaniards found they had to depend on Chinese traders to acquire the necessary provisions and ammunition to maintain peace and order in the islands. When silk made its appearance in trade, it became a highly valued article of trade for the Spaniards. It was not long before large quantities of silk were assembled in Manila for shipment to the Americas. Without the silk trade, the Spaniards would have found it unprofitable to maintain a galleon link between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

III

While trading with the Chinese in Manila, the Spaniards also discovered that commodity prices were very low compared to prices at home. Around 1575 Juan Pacheco Maldonado reported to Felipe II that "the prices of everything (from China) are so moderate, that they are to be had almost for nothing." Governor Santiago de Vera was also to write on June 26, 1587 in an official despatch that "they (Chinese traders) sell so cheaply that we can but think that either products are raised in their country without any labor, or that they find them without money."

The cheapness of Chinese products is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China's highly skilled craftsmen, low cost labor, and abundant raw materials combined to make for much lower production costs than were attainable in the Philippines. Meanwhile, the growing awareness by Chinese people of the convenience and value of using silver instead of paper notes and copper cash had greatly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silv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silver had steadily climbed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Manila merchants with silver to sell found that Chinese commodity prices were exceedingly low. Moreover, the Spaniards, accustomed as they were at home to an economy of a higher price level where silver's purchasing power was relatively lower, could not help but express astonishment at the large quantity of Chinese goods they could buy so cheaply.

Despite the fact Chinese goods sold at much higher prices in Manila than in China, the Spaniards were eager to trade and Chinese merchants earned high profits. Domingo de Salazar wrote from Manila in 1590 that "goods are sold at a very low cost in China; and, no matter how little profit they make there, when these objects are sold here they yield large profits." The high profits to be earned naturally motivated Chinese merchants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expand their export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By measuring the amount of taxes collected on ships arriving in Chang-chou we can show the growth of the Sino-Filipino trade. Total taxes on Chang-chou's foreign trade amounted to 3,000 taels each year in the period 1567-72, 6,000 taels in 1573, 10,000 taels in 1576, more than

20,000 taels in 1583, and an amount exceeding 29,000 taels in 1594. Thus, in roughly a quarter of a century, trade duties in Chang-chou increased nearly ten-fold. After 1594, these duties declined, but their level still exceeded that of 1567-72 by eight-fold. Because the largest share of taxes was collected from ships involved in the Chang-chou-Manila trade, we may conclude that this increase in trade duties provides a rough measure of the expansion of Sino-Filipino trade.

Aside from Chinese records, Filipino and Spanish documents also shed considerable light on the obscure character of Sino-Filipino trade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These documents show that, if galleons from Mexico are excluded, most of the foreign ships that arrived yearly in Manila came from China. The percentage of annual custom duties on imports of Chinese goods alone amounted to 70 and 80 per cent during the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Sometimes this share even ran as high as 90 per cent or more. These statistics indicate something of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Chinese goods in Filipino trade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IV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pain dominated the Pacific trade between the New World and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merchants shared in this trade considerably. Both parties mutually benefited from the exchange of silk and silver and made concerted efforts to maintain trade and increase it. The growth of exports from China to Manila increased employment at home and accelerated the inflow of the urgently needed silver from America. For the Spaniards, their consumption needs were satisfied, defense of the Philippines was strengthened, and their galleon trade earned enormous profits.

Yet, in spite of close and satisfactory 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conflic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were frequent during these centuries. These naturally reverberated on trade itself, causing many unhappy incidents. However, because both parties regarded the long-run advantages of trade to be more important, disputes were readily resolved, and trade soon resumed and prospered.